

# 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梁宗岱

栾 慧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以融通中西的平等眼光撰写了大量成熟的比较诗学论文,对中西诗学进行了微观而深入的比较,分析论述精细严密,并且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对我国新诗建设有着独到的理论建树,特色鲜明。梁宗岱对中西比较诗学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前学科时期具有相当的地位,对中西比较诗学建设作出了努力。

**关键词:**梁宗岱;中西比较诗学;新诗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2-0094-05

透过历史的烟云,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梁宗岱这样专心致力于诗学探索的学者。任何真正关注新诗发展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略他的功绩,尤其是他在中西比较诗学上作出的努力。随着学术界对新诗、比较诗学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梁宗岱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而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对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弃诗从药的原因及其翻译成就方面,对他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贡献关注不够。早在1935年2月,时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的梁宗岱出版了诗学专著《诗与真》,5月即再版一次;1936年,又出版《诗与真二集》。这两本书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把两部论著合并一册出版,认为梁宗岱“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德、法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学上的探讨,他的一些独到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这个评价是十分客观的。徐志啸认为:“从比较文学专著来说,初兴期与发展期两个阶段中可以称得上先问世的,大概要称梁宗岱的《诗与真》与《诗与真二集》了。……这就使得梁宗岱两本书的出版有其一定的历史意

义。”<sup>[1]94</sup>这是对梁宗岱比较诗学实践的充分肯定。卞之琳认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以宏观的高度,以中西比较文学的视角”论象征主义,至今还是“这方面的力作”<sup>[2]</sup>。梁宗岱是一位有着敏锐感受力与表现力的诗人,又是有着高超鉴赏力的批评家,对新诗的成就与弊病作出了及时而独到的评论。本文将主要从中西比较诗学史的角度来探讨作为诗学家的梁宗岱作出的贡献。

梁宗岱(1903—1983),字菩根,广东新会人,出版过诗集《晚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词集《芦笛风》(南宁:华胥社,1943年)。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与汤澄波等组建文研会广东分会,1924年赴欧洲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研习文学和哲学,后至德国、意大利学习德语和意大利语,同时写了许多法文诗,诗作发表在《欧洲》、《欧洲评论》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并且将王维和陶渊明的诗译成法文。1930年法译《陶潜诗选》由著名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作序,在巴黎Lemanyer出版社出版。他与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瓦雷里交往甚密,深受他的影响,在巴黎文化界拥有一定的名声,有“中国的拜伦”之称。梁宗岱的诗才曾受到罗曼·罗兰的

收稿日期:2006-08-03

作者简介:栾慧(1975—),女,四川达州人,博士研究生。

高度评价,其主要作品有《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论直觉与表现》、《屈原》等。他还将一些著名的外国诗歌译成中文,如《水仙辞》(瓦雷里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莎士比亚著)、译诗集《一切的峰顶》(歌德著,1936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发行)等。

由于梁宗岱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熟悉和对欧洲诗歌艺术的了解,对中西诗学均浸润深厚,故能以真正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中国的诗歌、艺术等问题,言他人未能言,见解独到。他以比较文学的方式探讨中西文学,尤其是诗学的种种异同,写作了大量专业的极有价值的中西比较诗学论文,见解独到,思理缜密。梁宗岱的中西诗学比较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深入到所比较的诗人作品中的诗歌意识、韵律结构、表现方式、语言风格之中,从诗的艺术文体进行比较和探讨,在中西比较诗学史的前学科时期拥有不能忽略的地位。

### 一 梁宗岱的中西诗学比较实践

梁宗岱对中西诗学进行了微观而深入的比较,分析论述精细严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泛览中外诗的时候,常常从某个中国诗人联想到某个外国诗人,或从某个外国诗人联想到某个中国诗人,因而在我们心中起了种种的比较——时代,地位,生活,或思想与风格。这比较或许全是主观的,但同时也出于自然而然。屈原与但丁,杜甫与器俄,姜白石与马拉美,陶渊明之一方面与白仁斯(R. Burns),又另一方面与华茨活斯,和哥德底《浮士德》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底关系都不止出于一时偶然的幻想。”<sup>[3]109</sup>他还进一步分析道:“他(指哥德——笔者注)和李白特别相似的地方何在呢?我以为有两点,而都不是轻微的:一是他们底艺术手腕,一是他们的宇宙意识。”<sup>[3]111</sup>在《谈诗》中他对马拉美与姜白石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底诗学,同是趋难避易(姜白石曾说‘难处见作者’,马拉美也有‘不难的就等于零’一语);他们底诗艺,同是注重格调和音乐;他们底诗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奇的,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sup>[3]92</sup>条分缕析,极为充分地论证了中西诗人及中西诗艺的异同与特色所在。

梁宗岱的中西比较诗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确证民族身份的文化认同的努力。从比较诗学的实际操作来看,梁宗岱不仅比较中西诗歌的“同”,也比较中西诗歌的“异”,他并不是要在西方文化中

消融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恰恰相反,是以追寻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前提的。梁对诗学建设的重要贡献是“象征主义”的中国化。在《象征主义》一文中,梁宗岱对中西象征主义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象征却不同了,我以为它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文心雕龙》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所谓‘微’,便是两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象征底微妙,‘依微拟义’这几个字颇能道出。”<sup>[3]66</sup>梁宗岱经由瓦雷里的理论对象征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整合,把“象征主义”理解为“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sup>[3]69-70</sup>,而象征之道,“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象征的两个特性则是“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即诗的情与景、意与象融成一片,暗示的意义与兴味丰富隽永。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已经融合进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是经过了重新阐释的中国化了的诗学观点,且进一步提出“纯诗”理论。他认为纯诗是“诗底绝对独立的世界”:“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像底感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sup>[3]95</sup>实际上是说诗歌要有独立的文体意识,即诗歌要保持其文体的“纯粹性”、“独立性”,而不能与其他文体混淆不清。他认为只有散文不能表达的成分才可以入诗,才有化为诗体的必要。这一观点正是针对新诗的“散文化”、“感伤的情调”泛滥等毛病提出来的,诗如果不对感情加以过滤而一味宣泄,那么和散文无异,因此要让新诗从“平实”、“滥情”、“浮浅”中超拔出来。“因为诗并不象大众所想象,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sup>[3]29</sup>。他在审美把握的基础上认为诗不仅是体验的、形式的,而且在其总体的境界上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也就是“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是对中国新诗发展流弊——反诗倾向的反拨,为中国新诗朝现代化的纯正方向发展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在今天仍具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 二 注重传统诗学现代转化的新诗理论

梁宗岱自己创作新诗,研究中对新诗着力甚多,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对我国新诗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20世纪20年代初期,白话新诗诞生以来,一味反古诗,摹仿外国诗,其弊端日益令人诟病。到了30年代,已经有新诗人进行反拨,如以格律诗体的倡导来纠正白话诗过于散漫无纪的状况,现代派诗歌也在努力探索新的诗艺。梁宗岱从理论上作出了总结,在《诗与真二集》中收集的题为《新诗的纷歧路口》的文章中,他针对当时新诗创作中存在的弊端,非常及时地指出:“和历史上的文艺运动一样,我们新诗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就是说,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所以新诗底发动和当时底理论或口号,——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sup>[3]167</sup>并且鲜明地指出:“文艺底了解并不单是文字问题,工具与形式问题,而是系于思想与艺术底修养尤重。”“就是为民众设想,与其降低我们底工具去迁就民众,何如改善他们底工具,以提高他们底程度呢?”<sup>[3]58,61</sup>这对初期白话诗只重白话不重诗的状况是一个有力的纠正,提出白话诗也要注意诗的艺术、诗的“真元”,否则会上“反诗”的道路。并且提出诗人要加强思想与艺术修养,与其迁就读者的水平,不如逐步提高读者的鉴赏力,这在当时一片“大众化”的呼声中是独树一帜的观点。

梁宗岱从理论上指出了新诗发展的方向,一是借鉴象征主义“纯诗”理论,一是从古典诗歌中汲取养料。梁宗岱重视汉语诗歌悠久的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他不像初期白话诗人一味否定传统,从语言工具到艺术表现一律破除旧诗的影响,而是坚信:“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因为我五六年来,几乎无日不和欧洲底大诗人和思想家过活,可是每次回到中国诗来,总无异于回到风光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一般地新鲜,一般地使你惊喜,使你销魂。”<sup>[3]30</sup>他把“二三十年光荣的诗底传统”比作“探海灯”和“礁石”,思考新诗“要怎样才能配得起,且慢说超过他底标准;换句话说,怎样才能读了一首古诗后,读我们底诗不觉得

肤浅,生涩和味同嚼蜡”<sup>[3]30</sup>。这是非常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期望。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新诗发出这样的疑问。梁宗岱意识到了新诗“手头现有的贫乏,粗糙,未经洗炼的工具”的有限性,提出要“承继这(指“诗的传统”——笔者注)几千年底光荣历史”,“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也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光荣传统,不仅如此,还要“辟出一个新颖的,却要和它们同样和谐,同样不朽的天地”<sup>[3]30</sup>。梁宗岱对中国新诗命运的殷切赤心可以见出。作为一位诗歌理论家,他的这番话无意中成为一种先声,呼唤出了30年代的徐志摩与戴望舒,自从这两位能很好地把古典意境与现代手法融为一炉的诗人出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几首现代新诗。

梁宗岱的《论诗》(1931)一文把诗分成“纸花”、“瓶花”和“生花”三个境界,“纸花”只能让我们“惊佩他底艺术手腕”,“瓶花”则让我们“感到它底生命”,只有“生花”才能让我们感到诗的生命而忘记了作者的匠心。认为“第三种却是一株元气浑全的生花,所谓‘出水芙蓉’,我们只看见它底枝叶在风中招展,它底颜色在太阳底中辉耀,而看不出栽者底心机与手迹”<sup>[3]26</sup>。梁宗岱认为“生花”才是艺术底最高境界,是一切第一流的诗所必须达到的,这才是我们诗歌的理想。以此观之,梁宗岱认为徐志摩所主编的《诗刊》第二期的作品最多只是“纸花”而已。梁宗岱的这一评价,是击中当时大多数新诗的要害的。他认为:“但活着是一层,活着而又感着是一层,感着而又写得出来是一层,写得出来又能令读者同感又是一层……”<sup>[3]29,30</sup>梁宗岱希望诗人热烈地体验生活,注重艺术修养,能够让诗歌生气贯注、感动读者,这是针对当时新诗感情粗浅、艺术粗糙的弊病有感而发的,引人深省。

龙泉明将梁宗岱的诗论纳入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框架进行评价,认为梁宗岱是现代派诗学的代表理论家,他的诗论不仅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全面,而且结合诗歌创作实际深入阐发了象征主义的本质特征,相对于李金发、穆木天等人基本停留于理论的介绍阶段是一个突破,他的“象征”论、“纯诗”论和“契合”论为现代派诗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sup>[4]55,56</sup>。作为留学欧洲七载,并且与当时的象征主义大师著名诗人瓦雷里交往密切的诗人,梁宗岱对欧洲现代诗学可谓浸润深厚,但并没有亦步亦趋,相反,他尤



其注重对传统诗学资源的现代转化,充分认识到古典诗歌的重要价值,这对于当时的白话新诗一味追新、矫枉过正地反叛古典诗歌是一个及时有力的纠正,体现出作为诗学家的梁宗岱敏锐的眼光和学术勇气。

### 三 梁宗岱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特点

第一,梁宗岱以完全平等的眼光、融通中西的视角,从艺术的角度鞭辟入里地发表自己对于中西诗学独到的见解,从中找出表现人类思想与情感的共通之处。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又游学欧洲七载,精通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深入了解西方诗歌三昧,所以避免了以西释中或移中就西的片面方式,不是对西方诗学亦步亦趋。梁宗岱认为:“要把二者尽量吸收,贯通,融化而开辟一个新局面——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明目张胆去模仿西洋。”<sup>[3]44</sup>他对于中国诗学持明显的赞赏态度,“是的,我深信,而且肯定,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sup>[3]30</sup>。即使谈到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也结合中国固有的“兴”来阐释辨析,建构出自己独特的诗学观念。

第二,梁宗岱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方式探讨中西诗学的种种异同,对中西诗人、诗歌观念与艺术技巧进行了细致探讨,极有价值。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作者对西方文学尤其是德国、法国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学上的探讨(包括《保罗梵乐希先生》、《韩波》、《忆罗曼罗兰》等),撰写了比较诗学专论《李白与哥德》、《哥德与梵乐希——跋梵乐希“哥德论”》,一些独到的见解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并且翻译了《哥德论》、《“骰子底一掷”》(皆为法国保罗梵乐希著)等介绍哥德、马拉美的诗学论文。在《屈原》一文中,梁宗岱对屈原与但丁的作品作了细致比较,分别从主旨(“追求理想的历程”)、作品形式(“都多少是自传体”)、思想渊源(“都是当代一切学术思想底总和”)、艺术造诣、接受(“两者都分受一切变为民族景点底伟大作品底共同命运:被后来底专门学者和考据家们穿凿附会和支解”)进行论述,令人信服。梁宗岱从1924年到1931年留学法国,深受法国文学影响。作为诗学理论家,梁宗岱具诗人气质,主要进行中西诗学研究,以真正平等的眼光、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思考中国的诗歌、艺术等问题,对中国新诗建设发表创见,对中西比较诗学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梁宗岱偏重诗歌理论的探讨,他自己创作现代新诗、法文诗并且翻译诗歌,感受力敏锐,鉴赏力高超,他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针对当时的新诗建设提出了切中肯綮的建议,他的批评方式是艺术化的,行文带有诗意和情感,思理严密,文采盎然。他的《论诗》、《文坛往哪里去——“用什么话”问题》、《谈诗》、《新诗的纷歧路口》、《按语和跋》、《诗·诗人·批评家》等文章专门探讨各种诗学问题,见解独到,切中要害,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点,而且笔触富有感染力。例如谈到诗歌的宇宙意识,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去表现那物我交融、悠然心会的境界:“可是当我们放弃了理性和意志的权威,把我们完全委托给事物底本性,让我们底想象灌入物体,让宇宙大气透过我们心灵,因而构成一个深彻底同情交流,物我之间同跳着一个脉搏,同击着一个节奏的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粒细沙,一朵野花或一片碎瓦,而是一颗自由活泼的灵魂与我们底灵魂偶然的相遇:两个相同的命运,在那一刹那间,互相点头,默契和微笑。”梁宗岱好动,感情热烈,行动迅速,富有诗人气质,行文活泼,笔端常带感情。梁宗岱早期创作新诗,16岁时就被称为“南国诗人”,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是文研会的第四位广东会员,出版过诗集《晚祷》(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十分关注新诗的建设,30年代是有名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一度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诗学研究水平,梁宗岱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精细的分析,对新诗着力甚多,专注于新诗建设和中西比较诗学的探讨,写出了专业的高水平的比较诗学论文。建国后,梁宗岱转而研究医学,颇具传奇色彩,未能继续耕耘于诗论,十分遗憾。他的翻译、诗集、论著等旧作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 四 梁宗岱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地位

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作者在30年代研究中西诗学的两本论著,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诗学研究水平,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西诗歌艺术,早在30年代就以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写出精彩的比较诗学论文。卞之琳认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以宏观的高度,以

中西比较文学的视角”论象征主义,至今还是“这方面的力作”<sup>[5]</sup>。徐志啸认为:“从比较文学专著来说,初兴期与发展期两个阶段中可以称得上先问世的,大概要称梁宗岱的《诗与真》与《诗与真二集》了。这之前,虽然也曾出版了一些涉及比较文学内容的专著……,但它们或内容不专,或为比较文化,或为译著,都非专门的比较文学专著。这就使得梁宗岱两本书的出版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sup>[1]94</sup>还有学者指出:“梁宗岱诗学建构的出发点:在中西两种异质诗学体系中寻找可沟通之处,发现二者的衔接点,以期能在一种‘共相’研究中展开一场深入的诗学对话。”<sup>[5]57</sup>

其次,梁宗岱全面介绍德国法国现代重要诗人,扩展眼界,以资借鉴,分析深入,论证严谨。在前学科时期,对中西比较诗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建设作用。作者在这里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德、法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如

歌德、罗曼·罗兰、梵乐希、韩波等)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学上的探讨,他的一些独到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再次,面对当时新诗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的诗学首要的任务是“要诗成为诗”,并对新诗的语言、音节、用韵、停顿等具体技巧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他大力论述的是新诗要继承中国几千年的诗歌传统,而不是像初期白话诗运动那样全盘否定传统,所以他反对“中国的诗,只能在世界文学上占第二流的位置”的思想。梁宗岱认为新诗的创造必须在诗人的体验和诗歌的形式创造基础上继承中西文艺传统,遗憾的是对有的问题还没有深入系统地展开论述。梁宗岱为我国早期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对后来的诗学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徐志啸.比较文学简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 [2]卞之琳.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J].新文学史料,1990,(1):27-28.
- [3]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 [4]龙泉明.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J].文学评论,2002,(1).
- [5]姜涛.论梁宗岱的诗学建构及批评方式[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56-61.

## Liang Zongdai in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History

LUAN Hui

(Literature & Journalism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Liang Zongdai, an important theorist in poetics in the 1930s,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plays a remarkable role in the pre-discipline period of the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makes hi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comparative poetics. He writes a large amount of mature articles in an equal view that harmonizes Sino-western cultures, makes profound microcosmic comparison and meticulous close analysis of the comparative poetics, focuses on artistic exploration of poetry and brings up unique characteristic theory for China's new poe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ang Zongdai;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new theory on poetry

[责任编辑:唐 普]